

从二元到一体:从历史人文区位学看 西南三线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张帆

摘要: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需要超越以往将少数民族塑造为经济发展滞后、政治转型被动的历史叙事。本文以西南民族地区的三线建设为例,从历史人文区位学视角出发,强调工业建设是社会性和物质性的双重生产过程,关注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社会关系及空间格局的影响,进而突破现代-传统、主导-依附、自然-文化等二元框架。本文指出,三线建设将各民族融入一体的工业景观、将多元的民族叙事转化为一体的工人叙事,构建出各民族作为主体共同参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

关键词:三线建设;历史人文区位学;中华民族共同体;西南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471X(2025)03-0086-11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25.03.002

一、引言

与单一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形态不同,中国在从帝国转变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不仅保留了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态,而且民族认同和现代认同直接参与了这一转变过程:^①20世纪初的“边政学”将民族叙事作为现代国家边疆叙事的重要部分,20世纪中期的民族识别工作进一步将民族叙事融入社会主义国家叙事。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一方面被纳入中国整体的历史叙事中,另一方面又被塑造成经济发展滞后、政治转型被动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如何构建一个各民族作为主体共同参与的历史叙事,成为亟待解决的学术命题。

围绕多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发展,民族研究领域逐渐发展出多种分析框架和叙事模式,^②其中一条重要的分析路径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受到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概念的影响,这一路径强调历史性、整体性地研究由水系和峡谷构成的民族杂糅地带,关注不同民族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不同民族不断融入“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③近年来,沿着这一路径逐渐形成了两个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领域,一是对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过程展开的经验研究,二是围绕何谓中华民族共同体展开的理论探索。围绕“三交史”展开的研究揭示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必须看到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共同性,看到历史上汉族并非单向影响少数民族,而是互相影响,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共同体形成的基础。^④类似的,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探索也倡导整合“族别研究范式”和“族际研究范式”,前者秉持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对各个民族展开独立研究,重视少

收稿日期:2024-12-01

作者简介:张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少数民族地区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发展遗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1BMZ166)。

^① 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8—79页。

^② 对于这些路径的梳理见张帆:《从“中间性”到“世界主义”:一种超越民族研究的“中心-边缘”叙事的尝试》,《民族学刊》2022年第5期。

^③ 参见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④ 石硕:《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1期。

数民族的文化整体性和独特性,克服了华夷之辨的局限;后者关注族际共享和越境分布的文化现象,重视文化的跨民族流动,能够更好解释多民族国家体制下的国民塑造和共同体认同。^①不过,这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讨论虽然受到“走廊范式”的影响,但是主要集中于对人群的历史变迁、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关注上,而忽视了“走廊范式”所强调的环境和社会、自然和文化的互动及其对共同体的形塑。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20世纪初就关注环境对文明形成的影响,分析游牧和农耕人群之间的历史拉锯及其对中华帝国的塑造,并指出以铁路和工业为标志的现代文明对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有深刻影响,最终造成不同人群的深度整合。^②这种对人群关系和人地关系的双重关注,也是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特点之一,他们以此研究美国社会在20世纪初期的急剧工业化和城市化对族群关系和城市生态的影响,进而提出“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理论。人文区位学关注人群和环境的互动,强调生态系统(ecosystem)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既包括制度文化也包括基础设施。^③中国社会学很早就吸收转化了这种基于城市社区研究而形成的思路,^④将其应用到对中国农村社区和少数民族社区的研究中——例如,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在对乡村的研究中就已经强调诸如地理、交通等自然因素对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影响;^⑤同时在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中就已经综合族团(ethnic unit)研究理论和人文区位学视角,通过对生产和交换的分析指出人、地关系的变化对社会组织形态的影响。^⑥

这些研究展现了环境和社会、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复杂联系,提醒我们人群之间的互动是在特定自然环境中展开的,从而揭示了费孝通所指出的“由水系和峡谷构成的”民族杂糅地带在理解“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不过,受生物学启发的“人文区位学”关注地方区位的“关系性”(relatedness),聚焦于作为人文社区的“小地方”,因此拘泥于社区的横向关系,缺少纵向的历史关系,无法把握社区存在的更大范围提供的条件,因此,需要借助历史学家(包括民族史学家)的成果。^⑦

基于此,一方面,本文从人文区位学视角出发,重新检视西南民族地区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地关系变化,揭示此变化如何影响人群之间的关系格局和空间结构,进而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本文将历史维度引入人文区位学分析,把工业化过程放置在地方的人群关系和人地关系格局的总体历史中展开考察。本文指出,从地方史的角度看,工业化过程是长期民族接触历史中的一个片段,也是地方营建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同时,从文明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结构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模式下的工农业格局,也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城乡关系。笔者认为,从历史人文区位学的视角出发来考察民族地区的工业化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在构建共同体意识和国家想象中的角色。不仅如此,对历史连续性的关注能够使我们打破既有民族志和民族史研究中隐含的“现代-传统”的二分,对于人地关系的关注能够使我们跳出社会理论中“环境-社会”和“自然-文化”的对立,对于各民族作为主体共同参与的历史叙事的强调能够使我们超越共同体理论中“主导-依附”的叙事模式,展现各民族人群深入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如何推动多民族区域的社会关系和空间结构从二元到一体的变化过程。

二、“三线建设”研究的进路和突破

西南民族地区最剧烈的工业化过程发生在20世纪60到80年代的三线建设中。“三线”是个政治地理学概念,指中央政府为了防备美苏在沿海、沿边区域的军事破坏,从沿海、沿边区域向内地划分出的三个地区:一线地区主要指经济最发达和处于国防一线的省份,二线区域主要指位于中部的国防二线省

① 周星:《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范式及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1期。

②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 Robert E. Park, “The Urban Community as a Spatial Pattern and a Moral Order”, in Ernest Burgess, ed., *The Urb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6; Robert E. Park,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3, no. 6, 1928, pp. 881–893; Amos H. Hawley, *Human Ecology: A Theoretical Essa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④ 岳永逸、熊诗维:《社会学实验:人文区位学中国化的演进》,《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6期。

⑤ 杨庆堃:《邹平市集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1934年。

⑥ 费孝通、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广西:广西省政府特约研究专刊1936年版。

⑦ 相关研究可参考王铭铭:《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王铭铭、罗兰、孙静:《聚宝城南:“闽南文化生态园”人文区位学考察》,《民俗研究》2016年第3期。

份,三线地区主要指中西部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韶关以北的腹地,主要包括西南(云贵川)、西北(陕甘宁青)以及豫西、湘西、鄂西等地。国家在三线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建设,总共投入超过两千亿元,调派超过几百万人,搬迁并新建一千多个工矿企业、科研院所等。^①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三线企业陆续迁至工业基础更雄厚、电力交通更便利的沿海城市,留在当地的企业大部分破产关停,少部分改组转产。

最初部分学者认为这一工业化进程是一项失败的国家工程,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② 随着研究的推进,更多学者指出,要在冷战背景下理解中国当时经济布局的调整和日常生活的组织,并将之与同期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基建潮以及苏联在中亚的工业发展相比较,从而看到三线建设的积极意义,揭示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借助工业和基建统一地方差异的努力。^③ 但是,这种从国际和国家出发的自上而下的视角也使得相关研究易于忽视对日常生活的考察以及对工厂之外的地方社会的分析。近年来,学者们从社会史和社会学等视角出发,借助口述史展开自下而上的研究,通过集体记忆、身份认同等概念来扩展对工厂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④

在这些研究中,莫(Mok Chung-Yuk)的研究另辟蹊径,关注工业进程带来的空间格局变化。莫指出,不同于“一五”时期的中央调控路线,三线建设时期转向大众方针发展路线(mass-line developmental strategy),这一路线将工厂与村庄、农民与工人、城市与乡村、政府与工厂等自下而上地卷入三线建设的整体性过程中,也让三线城市呈现出不同于“一五”计划下的工业城市的格局。因此,莫在对长春、十堰等工业城市的研究中,强调社会经济形态和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指出这些城市不同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大都市:在资本主义都市中不同群体随着资本流动、资源分配和基础设施的变化而在特定空间聚集或分散,构成不平等的空间结构;而中国工业发展初期的单位制、户籍制和计划经济规定了人口、资本和消费的形态,形成不同的城市空间格局,例如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和地方独立发展的双城(dual city,例如长春)、工厂在城乡之间隐蔽的散城(dispersed city,例如十堰)以及市场经济之下的以工业为城市发展驱动力的工业城(enterprise city)。莫的研究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空间维度,展现了国家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空间布局之间的关系。^⑤

尽管如此,莫的研究和此前大量其他研究一样,主要关注民族结构较为单一的区域,而忽视了三线区域多为多民族杂居区域,对这些区域在三线建设过程中的人群结构及空间格局的变化展开分析,不仅能更为全面理解三线建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影响,也开启了理解多民族共同体凝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因此,本文以凯里这个多民族杂居的区域为例,从历史人文区位学的视角出发,关照人文自然总体性,强调工业生产是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再生产,进而分析各民族人群转变为社会主义工人的过程以及城市和山寨转化为工业景观的过程。

下文基于对贵州凯里三线建设的历史研究和田野调查,首先从历史视角出发,勾勒出地方营建过程中的几个主要节点,指出凯里民族关系和城乡关系的结构特点。这一分析是历史人文区位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将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置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考察,破除现代-传统的二元对立,既看到一体化过程的历史延续性,也指出工业化在这一过程中的特殊意义。其次,考察三线建设过程中的人员流动和景观改造,尤其以少数民族新工人为例,破除“主动-依附”“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展现工业化过程中各民族职工共同缔造的新叙事、塑造的新景观。在分析中,本文参考了大量公开发表的地方志、地方文史资料、党史资料、调查报告、统计年鉴以及未公开发表的厂志、档案、回忆录、手稿等文

①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

② 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5, 1988, pp. 351-386;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Covell F. Meyskens, *Maoist China's Hinterland War Machine: The Cold War, Industrial Modernity,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Third Front, 1964-1980*,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5.

④ 见段娟:《近20年来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6期;徐有威、周升起:《近五年来三线建设研究述评》,《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张勇:《回溯与前瞻:多维视角下的三线建设研究述评》,《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⑤ Chung-Yuk S Mok, *China's Motor Citi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under State Socialism, 1948-90*, Doctoral Thesi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94, pp. 153-59.

献,同时也走访了凯里的十个三线工厂以及相关学校、医院的遗址和现址,访谈了数十位工人和干部。笔者认为,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区域三线建设的一个典型案例,凯里的三线建设揭示出社会主义初期工业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仅是一项工业和经济工程,更是一场国家营建的总体过程:随着不同人群参与工业建设,相关物质景观被纳入城市发展,这一过程铸造了一体工人叙事和一体城市景观,塑造出新的身份认同、历史记忆和国家想象,促进了民族关系格局从二元到一体的转变。

三、从二元到一体

(一) 凯里的三线建设

凯里位于贵州省东南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部,苗岭山脉东段北麓,清水江穿城而过,辖境东经107.58度,北纬26.35度。从自然环境方面讲,凯里山脉纵横,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从人文历史方面讲,黔东南区以苗族和侗族为主,是全国苗族人口最多的市级行政单位。

凯里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华帝国的边缘:春秋属南蛮牂牁国,战国属夜郎且兰国,秦汉属且兰县,隋属宾化县,唐属宾化、新兴二县,宋为绍庆府下羁縻州,元在凯里境推行土司制度,设凯里安抚司,名义上属于羁縻统治,实则为瓯脱之地。随着卫所制度和里甲制度等的确立,清雍正年间黔西北进入清朝版图,^①至乾隆年间黔东南的清水江下游区域也并入清朝的政治经济秩序。^②这极大地推动了汉族军民向贵州的流动,^③使得贵州总人口在18世纪猛增了数倍,^④贵州逐渐从“四面皆夷”转变为“汉夷杂处”的格局。^⑤

尽管如此,凯里位于清水江中上游,深入菁居峒处的“生苗”区,虽然雍正年间设凯里卫,但事实上施行土流并治,^⑥多数地区处于土司羁縻之中,少数隶属卫所管控之下,游离在帝国权力触角的边缘。因此,与贵州其他地方相比,凯里没有在清中后期出现“汉多夷少”的局面,反而是“其三司地,悉为苗产”,^⑦汉族人口比例很低,1874年仅有汉人两千余人。^⑧因此,虽然凯里在清代也出现了汉夷杂处的空间格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混居,而是汉人聚居于城池集镇,孤岛一般被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寨环绕;凯里也有汉夷互化的情况,但不成规模。^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凯里地区先后展开了民主改革和民族识别工作,这两项工作均以民族差异作为政策基础,如土改运动根据少数民族习俗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政策。^⑩这些工作有助于构建民族平等,不过,笔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工作中对差异的关注加剧了民族二元结构之间的张力。直至20世纪50年代,凯里的民族关系展现为外来的汉人和本地的苗侗等少数民族相互区隔的结构,在空间上体现为汉人官民主要聚居于城中、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山头村寨的格局。例如,1951年中央民族访问团在贵州考察时,作为副团长的费孝通听说当地有“苗家住山头,仲家住水头”的说法,指出这种空间格局的形成在于历史上汉人不断南扩,当地少数民族随之向山上迁移,这就导致苗侗人民多住高坡。^⑪1958年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凯里地区展开的调查显示,苗族多聚居于山头的村寨,间或有少量汉

① 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② 张应强:《木材的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9—42页。

③ 明代迁入贵州的军户,包括正军、余军及其妻室儿女,大致九万人,其中清平卫下属的凯里和清平,军额数近万人,见李储林:《交流、互动与融合: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8年,第55页。

④ 杨斌:《清代前期贵州人口的分布变迁》,《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⑤ 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第126—131页。

⑥ 凯里市人民政府编:《贵州省凯里市地名志》,临安:浙江省临安县印刷厂印刷(内部发行)1989年版,第1—2页。

⑦ 罗绕典辑:《黔南职方纪略》,《黔南职方纪略》,罗丽丽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87页。

⑧ 李储林:《交流、互动与融合: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研究》,第38页。

⑨ 林芊:《明清时期贵州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研究——以清水江为中心、历史地理的视角》,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65—81页。

⑩ 具体政策见中共凯里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凯里市党史资料·土地改革》(第四辑)(内部资料)1990年版。

⑪ 费孝通:《兄弟民族在贵州》,《费孝通文集》(第6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族杂居,多为行商;汉族多聚集于从前的屯、堡以及城乡大道附近,^①这些汉人聚居的城在苗语中遗留下特定表达,形成了今天诸多带“Yenx(营)”和“Tenf(屯)”的地名。^②这种空间格局也成为文野想象的基础——低地笑高坡、一截嫌一截,认为“高坡的人”生活水平低,文明程度低,不与其“开亲”。^③

由帝国中心与边陲、汉族与少数民族构建出的二元叙事结构和空间格局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迅速变化。首先,三线建设过程使凯里这片曾经被视为“仡佬人的稻田”^④的边缘之地转变为国防前哨和工业中心。费孝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现代工业虽然影响到贵州,但主要是以官僚资本主义的形式从贵州掠夺工业原料,这不仅没有改善少数民族经济,甚至破坏了其原本的自足自给经济。^⑤因此,凯里地区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工人仅有几百人。^⑥

1964年,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组织了对黔东南地区、贵阳以西地区、湘西和滇东地区44个县的踏勘,确立了以贵州为主的航空航天、电子、机械、电气工业基地。具体而言,在安顺、平坝,清镇的丘陵平原一带建设航空011基地;在都匀凯里一带建设国防电子083基地;在遵义、绥阳、桐梓建立航天061基地。此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器工业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及空军后勤部等部署安排的机械、电气、工具、仪器、仪表、机床、电机相关的建设项目。最终,贵州迁入了100多家企业和事业单位。^⑦

1965年到1979年,共有十家中央企业落户凯里,形成了从都匀到凯里的一套完整的电子工业体系。其中包括一家电子计算机整机生产厂,一家计算机外存储设备和输入输出设备生产厂,还有八家配套电子元器件加工厂。这十家企业承担电子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无线电通信机、电子测量仪器、电子元件这四大类产品的研制及生产,多种产品居国内领先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 and 北京、南京形成鼎立之势。^⑧截至1975年,上述十家企业产值占黔东南州工业总产值的40%,^⑨这使凯里在当时成为全国电子工业重镇之一。

20世纪70到80年代是凯里工业最辉煌的时代,老工人们骄傲自诩当年的凯里为“中国的硅谷”。凯里工厂的电子元器件和设备不仅贡献于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实验,也贡献于中国广播电视领域的电信革命——用卫星传送并用地面站接收信号。截至1985年,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在老、少、边地区建立的53个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中,凯里工厂负责其中8个站的建设,包括难度非常高的乌鲁木齐和拉萨地面站的建设,使新疆和西藏在1984年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顺利接收到中央电视台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⑩不过,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凯里原先隐蔽安全的优势逐渐变为偏远滞后的劣势,20世纪90年代,凯里的工厂纷纷启动破产倒闭程序,目前只剩一家企业还在运营,其余企业历经倒闭、清算、合并、重组,先于1984年在贵阳成立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公司,后于1997年改为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上市。尽管如此,在20世纪70到80年代,三线建设所奠定的工业体系使“贵州凯里”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国家“上天入海”的重大工程和沟通中央与地方的电信工程中。

更重要的是,围绕分散于凯里各地的工厂,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凯里为中心的交通运输网络。根据老工人的回忆,最初凯里四面环山与外界几乎隔绝,从外地进入凯里的唯一通道是坐火车到广西桂林,再

① 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口述,新中国成立前城里的土司和通事都是世袭汉族,寨子上的人都是苗族,见田雨等:《雷山县掌坡苗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苗族社会历史调查》(2),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187页。吴泽霖等指出,极少出现汉族女子嫁入苗族,偶尔出现苗族女子嫁入汉族,但前提大多是汉族先“苗化”被接受,否则的话,杂居时间即使再久,“汉边”永远是“汉边”,见吴泽霖等:《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苗族社会历史调查》(3),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② 李储林:《交流、互动与融合: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研究》,第55—56页。

③ 吴泽霖等:《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第88—89页。

④ 凯里是苗语音译,苗语称仡佬人为“凯”,田为“里”,凯里意为“仡佬人的田”。

⑤ 费孝通:《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费孝通文集》(第6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

⑥ 凯里市总工会:《建国初期炉山县的工会工作》,中共凯里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凯里市党史资料》(第5辑)(内部资料)1991年版,第213页。

⑦ 覃爱华编:《三线建设在贵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6—19页。

⑧ 徐祖哲:《溯源中国计算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63—678页。

⑨ 政协黔东南州委员会编:《三线建设在黔东南》,北京:线装书局2017年版,第7—21页。

⑩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风雨兼程四十年》编委会:《风雨兼程四十年(1964—2004)》,贵阳:贵阳经纬印刷厂(内部资料)2004年版,第122—137页。

从桂林转火车到贵州谷硐,然后搭乘货车走苗岭盘山公路进入凯里。这严重阻碍了生产运输的需要,因此国家在贵州规划了密集的公路铁路运输网络。数据显示,1965年凯里市的公路运输客运量是1962年的3倍,货运量接近1962年的4倍。^①随着1974年湘黔铁路竣工,凯里东与湘赣铁路相接,西与贵昆铁路连通,进而连接浙赣铁路。达拉科格罗(Dimitris Dalakoglou)在对阿尔巴尼亚政治转型中高速公路建设的研究中强调,道路不简单是交通网络,在决定将一个地方纳入或排除于交通网络的过程中,是政治力量、市场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角逐。^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凯里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建设从根本上将凯里这个曾经的帝国边缘并入国家的整体工业景观中,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节点。

其次,随着1956年被设立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1964年被选中成为三线建设的电子工业中心、1983年由县升为市,凯里经历了极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地关系由此发生剧烈变化,进而带来了城市格局及民族关系的转变。下文分别从两个方面展现这种转变:第一,工业化过程铸造了共同的工人叙事,这种叙事打破了明清时期文野相对、生熟有别的文明化叙事;第二,城市化过程塑造了一体的城市景观,这种景观重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汉城苗寨”的空间格局。

(二) 锻造共同叙事

以往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将三线工厂看作单位制下独立自足的封闭社会,因而其分析多集中在作为三线移民的汉族工人群体,倾向于指出三线工厂有固化的内外结构,缺少与地方社会的有机联系,形成与当地社会相互区隔的社会身份。^③不过,也有研究通过分析“工农结合”和“厂社结合”等政策指出三线工厂和地方社会之间形成义利往来和人情互惠。^④凯里的三线工厂也采用了军事化管理和单位制组织的运作模式,且直属中央,在很长时期内地位和效益都远远高于地方,和地方社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区隔。尽管如此,大量本地劳动力参与了凯里的三线建设,尤其是凯里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劳动力也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三线工业体系。

首先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阶段,黔东南州抽调了大量民兵、农村劳动力参与建设,有近二万名民工以及木匠、泥匠等农村劳动力先后参与了工厂的建设,有近六万名民工、100多名干部参与了湘黔铁路的修建。^⑤参与大型国家工程的过程也是塑造新的国家观念的过程。以凯里胜利厂的建设为例,^⑥在建设初期的“四通一平”(通水、电、路、邮和平地基)中调动了周边两个公社7个大队300~800名民工,技工和民工的比例为2:300。工厂给民工发放毛泽东著作,并利用因雨停工以及工闲休息的时间组织民工学习老三篇,向民工宣传国际形势、特别是战争形势,宣传为什么建工厂、为谁建工厂、建工厂对国家对社会有什么好处。^⑦新的国家想象、新的身份认同随着人员调派和宣传教育逐步进入地方社会。

其次是在工厂落成投产之后,通过各种方式吸收本地劳动力以补充工人的不足:一是社会青年就业,二是退伍军人转业,三是知识青年(后来是中专生和大学生)分配,四是农村青年帮工(也叫“轮换工”)。^⑧从胜利厂1971年接到援建新厂的任务进行人员统计的数据来看,从本地吸收的工人占比相当高:老厂(北京XX厂)支援人员180余人,贵州省内招收人员170人,转业军人100余人。^⑨截止1971年,根据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的统计,凯里三线工厂在黔东南本地招工1394人,基本来自少数民族人口占

① 贵州省凯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凯里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692—693页。

② Dimitris Dalakoglou, *The Road: An Ethnography of (Im) mobility, Space, and Cross-border Infrastructures in the Balka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③ 张勇:《区隔与融合:三线建设内迁移民的文化适应及变迁》,《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郭旭、刘博:《“我们”与“他们”:三线人的自我认同与群体区隔》,《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陈超、周明长:《标签化的族群:一个三线企业中的社会结构》,《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④ 彭涛:《单位互惠视角下三线企业建设初期的工农合作——以黔东南德胜厂为例》,《开放时代》2022年第3期;李德英、粟薪樾:《三线建设初期“厂社结合”模式检视(1965—1966)》,《史林》2020年第5期。

⑤ 政协黔东南州委员会编:《三线建设在黔东南》,第21页。

⑥ 本文出现的工厂名和人名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胜利厂于1965年批准建立,1968年通过验收进行投产,其主要产品为电子计算机外存储设备和输入输出设备,1999年进入破产程序。

⑦ “一九六五年本厂筹建工作和初步总结”,卷号5,胜利厂资料室。

⑧ 轮换工就是工农互助时期作为互惠招收的当地公社的农民,一个公社的所有体检合格的适龄青年可以轮流来厂里工作,因此叫作轮换工。

⑨ “关于支援新厂建设任务的意见报告”,革政字(71)001号,胜利厂资料室。

比高的凯里、麻江、丹寨、黄平等地。^①虽然当时的人事档案很少登记工人的民族身份,但是在伤亡鉴定和处分报告中会明确注明籍贯和民族,^②从中可以看到本地劳动力中有相当高比例的少数民族工人。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民族政策再次被强调,例如,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劳动总局联合下发文件强调尊重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职工的饮食习惯。^③随后在人事档案中开始明确出现“民族”,并将其和姓名、性别、工种、职务(职称)等分类范畴并列;例如,在1988年胜利厂工会的《第五届职工/八届工会代表名单》上,机加、一装、机动、机关等部门都有少数民族(彝族、苗族)职工代表。^④

各民族工人在进入工厂后,先经历三个月的军事训练,在军事化管理模式下形成统一的生活节奏,侗族工人秦师傅至今依然对早上6点的起床号、上班时的集结号、下班时的解散号记忆犹新。^⑤军训后工人们被按照工种分配到各个部门,在师徒、小组、车间中形成新的社会依附关系,并按照工龄、技术级别和职务形成新的差异表述体系。每个人的生活都在新的生活节奏、社会关系和等级体系中展开,形成一套围绕车间、宿舍、待遇的新叙事。在这套叙事中,民族差异不再成为团结和区分的主要参照,工人间的差异性被表述为工龄、工种、职务等的差异,工人间的共同性则被展现为生活节奏、晋升制度、福利待遇的标准化和制度化,例如,杨师傅和王师傅夫妇将工厂社会描述为“人和人之间没有区别”“大家的差别只是工龄长短”:

那时候的厂区全是平房,干打垒盖起来的平房,所有人都住宿舍,没有任何的级别差异,不管是干部工程师还是工人,大家的差别只是工龄长短。结婚之后可以申请夫妻宿舍,就是一个小单间,小单间里面有单位集体配的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和一张桌子。等有了孩子之后,可以申请家庭宿舍,就是一个小隔间,里面有厨房和厕所。申请小单间和小隔间也是按照工龄来排队。

虽然当时条件差,但是大家都非常骄傲,因为单位福利好。举例来说,会给生小孩的女工安排哺乳时间,单位配套有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有主人翁精神,人和人之间没有区别、没有等级,大家都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做领导甚至可能比做工人要更辛苦。^⑥

杨师傅是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被招进厂的苗族青年,其父母来自凯里周边村寨,父亲在凯里解放初期参加剿匪成为地方干部。王师傅则是一名祖籍福建的汉族知识青年,随作为南下干部的父亲来到凯里,在下放上调之后被分配到厂里。杨师傅入厂时被分配到运输科开车,后来逐步成长为厂长,而王师傅入厂被分到检验科直至退休。不仅在这对夫妇的上述回忆中,而且在很多其他职工的回忆和口述中,婚姻、生育、福利、待遇等都和民族身份没有关系,只和工龄相关。职工们还常常以宿舍、食堂、灯光球场、游泳池、电影院等来描述计划经济之下的集体生活,这些物质景观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对于平等性、先进性、集体主义等价值观的塑造过程。正如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指出的,基建并不仅仅是物质景观,同时也体现和生成价值。^⑦在这种统一化、标准化和制度化的生产和生活中,各民族职工感到“非常骄傲”,生出“主人翁精神”。

笔者认为,这种主人翁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职工对工厂的高度依附性。华尔德(Andrew Walder)指出,社会主义工厂形成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工厂的新型社会结构,表现为职工对工厂的高度依附——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党政领导,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于车间。^⑧在凯里的三线工厂,这种依附关系一方面展现为等级性依附,也就是说,工人们沿着新等级体系从学徒

^① “关于083系统招工指标最后调整的通知”,黔东南自治州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计划组文件,(71)革生计字第0013号,胜利厂资料室。

^② 见胜利厂资料室的人事档案,这些档案都涉及少数民族工人。

^③ “关于妥善解决回族等职工的伙食问题的通知”,财政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劳动总局文件,(78)财事第170号,(78)民政字第055号,(78)劳薪字第30号,胜利厂资料室。

^④ “国营XX厂第五届职工/八届工会代表名单”,卷号41,胜利厂资料室。

^⑤ 秦昌禹口述,杨帆整理,载陈剑虹编著:《神秘代号背后的建设人生——贵州黔南三线人口述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⑥ 2023年7月26日杨师傅夫妇的访谈。

^⑦ Caroline Humphrey, *Ideology in Infrastructure: Architecture and Soviet imagin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o. 11, 2005, pp. 39–58.

^⑧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到工人、从一级工到九级工、进一步荣升为劳模或晋升为干部,由此生成了工龄、职务(职称)和贡献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待遇的差别,^①也构成职工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和荣誉感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这种依附关系也展现为情感性依附。限于当时的交通状况和休假制度,职工探亲比较困难,因而在师徒、小组、车间中延展出类家庭制度:

那时候是按照小组来算,一个小组的工人都是学徒的师傅。师傅跟徒弟那时候关系很好,我们的装配车间要求非常高,每个人都要穿白大褂,戴帽子,戴手套,我每个周六晚上,把师傅的衣服帽子手套带回家洗干净,周一早上带过来给师傅,那时候我还帮师傅带小孩,师傅也照顾我们,经常让我们到家里吃饭。^②

苗族工人文师傅如此描述当年的师徒情谊。文师傅最初是轮换工,后转为学徒工,三年学徒期满之后转正成为正式工人,后来有了自己的徒弟,她和师傅以及徒弟至今依然保持着联系,同时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文师傅的爱人是个侗族军人,服役三年后转业到工厂后勤部门。当时几乎所有工人都处在类似的师徒关系中,例如,车工蒋师傅在2012年写给自己师傅的悼词中回忆道,“进厂几年后我准备结婚,当时没有家具,师傅就亲手帮我做家具……每遇逢年过节,若是我们不回家,师傅就叫我们到他家过节。”

对工厂的高度依附使工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对传统的家族、宗族、民族等社会关系的依附,以工龄和职务(职称)为基础的新的差异表述体系逐渐取代了以族群和文化为基础的旧的差异表述体系,其中先进和落后的区别不再是民族和文化的区别,而是工龄、职称和贡献的差异,因而民族身份不再作为社会关系构建的决定性指标,不再限制上下级、师徒、同事、婚姻等关系的形成,曾经“不开亲”的人群之间也开始通婚。

华尔德认为社会主义工厂的社会关系是特殊主义的(particularism),不同于资本主义工厂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特殊主义表现为一种以忠诚为基本要求的依附庇护关系(patron-clientelism)。不过,凯里三线工厂的特殊主义并非简单上下级之间的依附庇护关系,等级性和情感性依附生成了一种包含荣誉和人情的互惠共生关系,这种关系被扩大形成一种家、厂、国一体化的新叙事:

有一次,厂里所有人都集中在厂后面的小山坡上收听广播,因为那里信号好,广播是关于东方红卫星上天的,因为我们的设备被用在了东方红卫星的生产中,后来还用于生产水下潜艇导弹等等,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可以听得见看得见我们的成果给国家带来的利益,大家在听广播的时候都激动地哭了。^③

职工们不论性别或民族,在访谈和口述中常常使用“主人翁”“国家的利益”等表达,老职工们自发编写印制的回忆录中几乎一半篇幅都是产品奖状的照片,^④参加过西藏地面信号站建设的崔师傅至今还在家中挂着在布达拉宫前的照片,参与访谈的职工们都会反复回忆1970年东方红卫星上天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工业进程同时也是政治和情感工程,正如拉金(Brian Larkin)指出的,基础设施作为政治工程,其政治性常常附着感情,因此,参与建造卫星的印尼工程师们放弃竞争紧密团结在一起,巴西首批电信工程师用虔诚的语气谈论无私的奉献,尼日利亚通讯人员为自己的奋斗而产生深刻的满足感,在这个意义上,工厂既生产产品也生产意义,基础设施的政治学附着于诗学。^⑤

综上,随着三线建设带来的大规模工业化,大量本地劳动力、包括少数民族工人被吸纳进工厂,各民族职工在工厂统一的生活节奏和集体主义式的物质景观中,纵向形成了新等级关系,横向发展出新社会支持网络,使得职工的生活、荣誉感以及身份认同都高度依附于工厂及其产品,从而从传统的社会关系

^① 例如,根据连续工龄从25年到35年不等、职务(职称)从中级技术职称、省级劳模、厂级干部等变化,住院床位档次从4元到15元不等。参见“关于职工收住四一八医院康复病房的暂行规定”,厂卫字(1986)第086号,胜利厂资料室。

^② 2023年8月18日文师傅的访谈。

^③ 2023年8月13日崔师傅夫妇的访谈。

^④ 见由吴智益、杨胜仙等老工人们编写印制的《翁牙河岁月——XX厂离退休职工纪念册》,凯里市同兴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制(内部发行)2016年版。

^⑤ Brian Larki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no. 42, 2013, pp. 327-343.

中脱嵌出来,逐渐形成了家、厂、国一体化的国家想象和价值体系。

(三) 塑造一体景观

侯丽指出,1952年中央政府将工业城市分为四类,在苏联城市规划理论的指导下对重点工业城市进行了规模宏大的规划,随着1960年的政策调整,中国的城市建设陷入暂停,直到1966年,“大庆模式”确立了从集中到分散、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城市发展路线,这种“分散的村庄”式城市图景展现出跨越工农分化、城乡对立的平等主义的社会理想,被推广向全国。^①这种社会理想和发展路线使社会主义城市不同于资本主义城市和历史上的明清卫所,城市的分布和发展不严格受限于交通、市场、资本、资源等因素,因而深入山区密林,将山寨纳入城市,形成了城山一体化景观。

凯里的工业化过程遵循“靠山、隐蔽”的政策和“山、散、洞”的选址原则,厂区和生活区散布在山坳里,同时在大庆模式的指导下,工厂布局极其分散,被工人们戏称为“羊拉屎”,与山上的苗族村寨比邻而居。随着工厂规模日渐扩大,工厂不断从周围公社收购田地、土地、林地,并和村寨共享一部分水源、公路和电路,在景观上逐步与村寨连接起来。^②不光在景观上,在生活上,很多工厂不仅在最初的基建过程中依靠村民们的支持,在后来“军民共建、厂社一家”的政策下,工厂还经常帮助村寨抢收抢种、运输肥料、供水供电。例如,瓦寨村苗族老人依然记得,工厂派电影放映队和文艺宣传队到大队放映和演出的情景,也记得厂里派人给大队拉电线结束其油灯照明的历史性时刻;不仅如此,厂区设立的医院也给当地农民看病,这催生出苗语新歌谣:“半边李子半边桃,半边是汉半边苗,民族团结在一起,和睦相处家平安。”^③

从1965年到1979年,随着中央企业的进驻,也带动了地方电子工业及相关工业的发展,在此期间黔东南州先后新建了标准紧固件厂、喇叭厂、无线电厂、磁性材料厂等数十家地方工业企业。同时,中央政府和贵州省政府还在黔东南州相应配套新建了818医院(后为418医院)、贵州无线电技工学校(后为贵州无线电工业学校),以及一个电话站、二所技工学校、十所职工子弟学校、一所高中。^④

随着工厂、医院、学校陆续动工、不断扩建,凯里的城市化进程也急速推进。1956年初,凯里在老城以南规划建设了以大十字为中心的四条主干道,修建了州委大楼、邮电大楼和百货大楼等,城区面积仅3平方公里;1964年,围绕大十字扩建了商业区、教育区和住宅区,城市的范围东延至洗马河、西延至杀人坳、南延至大友庄,面积扩至9平方公里;1983年,贵州省政府着手对凯里进行新的规划,1985年,新的规划方案通过,城区总面积增至31.1平方公里。^⑤因为城市沿着工厂扩张,逐渐将原先工厂修建的内部道路延长和城市连为一体,所以凯里城区的大量街道和公交站是以三线工厂命名的:永华路、华联路、红州路、永华厂、262厂、242厂等等。根据凯里市政府1985年出台的《凯里市城市建设和管理暂行规定》,首先,凯里市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定位是“以发展建材、电子工业为主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社会”,其次,明确规定了凯里城区的范围,即,东至永华厂、华联厂、赵家村,东北至七里冲坳、三板桥,东南至242厂、小坳,西南至棉纺厂,南至小高山北坡、芦笙场,西至玻璃厂、地质六队、苦李坳,北至石油仓库、机务段,西北至郭家坪。^⑥非常明显,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凯里的发展定位和边界范围依然以三线建设的工业布局为基础。

城市规模的扩大也带来了人口结构的变化。自1949年起,凯里人口变动经历了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1956年成为自治州首府之后,大量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子女迁入,凯里的侗族基本为这一批迁入的干部职工及其子女;第二个高峰是1964年三线建设开始之后,随着1970年左右10家工厂及附属支持企业和机构在凯里逐渐扎根,大量外来干部职工、本地工人及其家属子女迁入。其结果是,1949年凯

^① 侯丽:《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张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117—119页。

^② 例如,从1965年动工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胜利厂长不断从附近的公社征用土地,有大量土地征用协议。协议中有的土地直接补偿钱款,有的土地则以工厂为公社修建公路、架设电线、修建水坝、支援水泥、购买磨面机、安装水轮发电机等方式进行补偿。(参见胜利厂基建档案“1977年—81年本厂关于征用土地报告、协议书和上级批复”,卷号72)

^③ 张应文、张应春、张应明口述,熊贵伦、伍亮整理,载于政协黔东南州委员会编:《三线建设在黔东南》。

^④ 政协黔东南州委员会编:《三线建设在黔东南》,第22页。

^⑤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黔东南州志·城建环保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⑥ 见“凯里市城市建设和管理暂行规定”,收录于《黔东南州志·城建环保志》,第342—351页。同时作为文件“凯市府(1985)1号”下发各三线企业,存档于胜利厂资料室。

里市区的人口为 9915,1970 年遽增至 71076;第三个高峰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对外开放,大量人口迁入和迁出。^①经历了这三次高峰,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凯里市区的四个街道中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各占比接近一半,^②基本打破了以汉族为主的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的高坡村寨之间的格局。

城市化使曾经文明和野蛮的分野逐渐弥合。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工厂最初坐落在名为“羊角冲”“三棵树”“野猫冲”等山坳中,在工人们的回忆里,这些地方无异于蛮荒之地——“路的一边是稻田,一边是荒草坡”。^③老工人杨师傅在诗歌《凯里变了》中写道:

早年的凯里城,以大十字为中心,往四面延伸一两公里处,都有一个令我们做小孩时玩耍感觉恐怖的地名,东面是野狗冲、往南老猫冲、西面杀人坳、往北翻过大阁山是老猫洞,洪荒猛兽,令人恐怖战栗。^④

杨师傅的诗歌展现出城市建设过程中新景观逐渐覆盖旧遗迹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带来的文野想象的变化。被视为文明之地的“凯里”,最初指可以“赶场”买东西的凯里老街。凯里老街,是凯里老城的一部分,在这片街区中,东门街和西门街这些沿用下来的地名明确指出明清时期的城区布局和城门位置——老街西侧临着龙头河,曾经外来的汉族商贾云集,老街东侧连通魁星阁和万寿宫,曾经象征中央王权和中原文化。随着三线建设,凯里老街成为当地少数民族、地方职工、中央厂矿工人交易的场所:“在每周例行的赶场时,原本熙熙攘攘总是晃动着靛蓝色土布衣、苗家百褶裙的街市,突然也从四面八方涌进好多劳动布工装,他们不太讲价的采购,崭新的一色穿着,和掺杂着地方方言的普通话,让这个小镇,变得有些异样。”^⑤而被想象为“洪荒猛兽”的“杀人坳”和“万人坟”等地,在清代曾是斩杀犯人的场所,也是地方官员宣德政的地方,直到民国时期还立有多块“德政碑”,^⑥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被改造成人民会场,随着改革开放又被改造成万博广场,^⑦如今已经成为繁华的闹市区,高楼林立、街市栉比,构造出新的文明景观。

综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于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突破了资本积累、资源配置及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从而实现了在偏远山区的大规模快速推进。三线建设的工业布局深刻影响了多民族聚居区的城市空间拓展与人口结构变迁,在新的城市景观中,自然山地被整合进城市空间,原始荒野实现了城市化转型,通过重构空间与重新命名,消解了曾经对文野边界的想象。

四、余论

本文考察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三线建设对凯里的城乡格局和民族景观的影响。凯里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明清两代的经营虽然使贵州一带纳入帝国版图,但是凯里在新中国成立前总体汉人占比低,呈现出帝国中心与边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二元叙事结构和城市与山寨的二元空间格局。随着成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并将凯里定为首府,凯里的城市规模和人口结构逐渐变化,尤其是在三线建设过程中凯里被定位为电子工业重镇,城市发展和工厂生产带来人口流动,20 世纪 50 年代的汉族、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大量进入凯里,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汉族和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逐步进入城市,从而突破了城市和山寨的边界,使不同民族人口融入工厂和城市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以工厂待遇、单位福利、国家贡献等为表述的新的工人叙事,一体的工业景观和工人叙事带来二元结构向一元的转变。

凯里的案例具有典型性,有助于扩展三线研究的理论视野。以往三线研究大都将三线建设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并深耕于其历史细节,例如徐有威和李德英等学者多年来对三线相关档案文献和口述历史的抢救性收集,^⑧这些研究使得曾经被忽视的三线工业史的轮廓及其独特性更清晰地显现出来,奠定

① 贵州省凯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凯里市志》,第 86—91 页。

② 同上,第 80—81 页。

③ 鲁师傅口述,载于吴智益等编:《翁牙河岁月——XX 厂离退休职工纪念册》。

④ 杨师傅手稿,写于 2019 年 5 月。

⑤ 葛兆光:《非青非红》,《贵阳文史》2009 年第 5 期。

⑥ 中共凯里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凯里市党史资料》(第一辑)(内部资料)1987 年版,第 75—76 页。

⑦ 2023 年 7 月 26 日和杨师傅夫妇的访谈。

⑧ 徐有威、陈东林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 6 辑):三线建设研究者自述》,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了三线研究的基础。与此同时,周晓虹等学者借助集体记忆、身份认同等概念将三线研究推入社会学视野。^①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三线建设前后凯里的城市布局、地理空间、基础设施的变化及其对人群关系、民族格局的影响,籍此将历史人文区位学的视角引入三线研究中,强调不同人群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生成一套既包含不同人群的文化特质、也包含其营造的物质景观的生态系统,同时强调物质和空间在构建社会生活和关系中起重要作用,从而超越环境-社会、自然-文化的对立,将环境、空间、物质等维度与对社会互动和历史变迁的讨论相结合,进一步拓展了三线研究的地平线。

不仅如此,凯里的案例也有助于构建民族共同体叙事研究的新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族研究领域,一部分研究借助战后西方兴起的族群理论展开分析,聚焦于围绕民族、族群、性别、阶层等概念的分类及叙事以及相关的机构制度安排和知识生产过程,将身份认同视为一个博弈空间。在这个视角下,对族群性(ethnicity)的关注让位于对少数性(minority)的强调,展现少数民族在国家建构过程中被边缘化、女性化或者浪漫化的过程。^② 还有一部分研究沿着费孝通的“走廊范式”展开,将不同群体之间互动演进的历史内置于中国文明在不同政治形态中展开的历史,以中国文明作为对西方民族国家概念的反思。这两种研究进路隐含着现代中国和传统中国的割裂,使对民族地区现代化的研究和民族史的研究逐渐分离。本文通过对历史连续性的关注,尝试弥合传统-现代、主导-依附的二分,指出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城市化进程是长时期的人群关系和人地关系变迁的组成部分,在一定时期内消解了二元的民族关系和城乡景观格局,铸造出一体化的工人叙事和工业景观。

From Dualism to Unity: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in Southwest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rom a Historical Human Ecology Perspective

ZHANG F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requires moving beyond previous historical narratives that portrayed ethnic minorities as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nd politically passiv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in the ethnic regions of Southwest China as a case study. Departing from the historical human ecology perspective, the article emphasizes industrialization as a dual process of social and material production, examines the impact on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patterns through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further challenges the binary frameworks of modern-tradition, dominance-dependence and nature-culture. It argues that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integrated all ethnic groups into a unified industrial landscape, transforming multiple ethnic narratives into a cohesive working-class narrative, thereby developing a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which all ethnic groups participate as active subjects.

Key words: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historical human ecology;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outhwest China

[责任编辑 梁利华]

^① 周晓虹:《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7期。

^② Louisa Schein, *Minority Rules: The Miao and the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Dru C. Gladney, *Dislocating China: Muslims, Minorities, and Other Subaltern Subjec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